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三大体系”建设：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刘永明

(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 北京 100012)

关键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早期建设

摘要：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即确立了科学主体的地位，并在 20 世纪 40 年代确立了其民族科学大众的根本性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三大体系”建设的理论基础是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三大体系”有其丰富的内涵但三者发展并不平衡；“三大体系”建设具有开创性和范式性，对后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24)-013-09

DOI: 10.13399/j.cnki.zgwxj.2024.04.002

Construction of “Three Major Systems” in Chinese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New-Democratic Revolution Period

LIU Yongming

(Institute of Marxist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Chinese National Academy of Arts, Beijing 100012)

Key words: Chinese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discipline system; academic system; discourse system; the early phase of the construction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Democracy Revolution, Chinese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established the status of a scientific subject, and in the 1940s established its fundamental natur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materialist dialectics were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ree Major Systems” of Chinese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during the period of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Three Major Systems” have their own rich connotations but their development is not balanced. The early phas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ree Major Systems” of Chinese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was groundbreaking and paradigmatic,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ter Chinese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system.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不再如同晚清以来仅作为西方社会主义理论的知识体系被介绍和传播到中国来，其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为随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到了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已经开始成为中国无产阶级政治实践、社会革命、文化革命的指导思想，并且在整个思想界逐渐取得领导地位。在这个大的理论背景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开始发生、发展。

1920 年 1 月 4 日，李大钊在《星期日周刊》“社会问题号”上发表文章《什么是新文学》，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开端之作^①。这篇文章虽然仍强调“以博爱心为基础”“博爱的精神”，主张“为文学而创作的文学，不是为文学本身以外的什么东西而创作的文学”^[1](P129-130)]，不能算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文学

[收稿日期] 2024-07-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艺术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现状评估与建构目标及评价标准研究”(23ZD01)

[作者简介] 刘永明，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①学界对这个判定有争议。参见朱德发《试探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五四文学初探》，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47 页。

观,但从文本群的角度来看,此文发表在李大钊完成马克思主义立场转向之后,之前《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中的“主义”内涵已有特定所指,所以《什么是新文学》中的“坚信的主义”毫无疑问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因此,这篇文章文本性质无疑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它也宣告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诞生。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生之后,很快确立了自己的科学主体地位,并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创新。到1949年之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仅诞生了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代表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建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还为其后来理论体系的发展、完善和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科学主体、根本性质的确立与学科体系的建设

马克思主义最早是以科学性和革命性的形象进入中国的。1898年,在中国近代出版物中最早提到马克思及其学说的著作《泰西民法志》即写道:“马克思是社会主义史中最著名和最具势力的人物,他及他同心的朋友昂格思都被大家认为‘科学的和革命的’社会主义派的首领。”^②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质与中国近现代科学观念和科学主义的传播与发展相结合,在客观上产生了三种效果:一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二是对一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和立场的转变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是经过20世纪20年代数场思想论战,到1930年前后,唯物主义成为科学主义的最高形式,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地位最终确立且占据了时代思想的主导地位,甚至被信仰化。伴随这一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一种科学的文艺论,不仅其科学主体地位、根本性质很快得到形成和确立,学科体系也开始发展起来。

1.“科学的文艺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科学主体的确立

1928—1929年发生的“革命文学”论争和1930年“左联”的成立引发了系列理论问题,增强了对科学文艺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需求。为此,从1929年中期到1930年中期,上海刊行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著,这就是鲁迅、冯雪峰等人参与翻译,由水沫书店、光华书店出版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③。曾任水沫书店编辑的施蛰存回忆说,《科学的艺术论丛书》曾短暂地改名为《马克思主义文艺论丛》^{[2](P110-112)}。鲁迅后来称“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即是《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之一种。

这套丛书的诞生,与当时人们已经普遍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视为一门科学的观念有关。鲁迅、冯雪峰就是这种认识的代表。作为《科学的艺术论丛书》的策划人和主要译者,鲁迅、冯雪峰有很强的“科学的文艺论”观念,他们从科学—社会科学—文艺科学这个科学主义的逻辑上,对“科学的文艺论”做了较多的论述。

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科学主体观念有了新的发展,“马列主义的文艺科学”概念开始正式使用。1932年,瞿秋白在《文学月报》发表《论弗理契》,其中不仅直接把文艺列为社会科学之一,“文艺是社会科学之中‘最细腻’的一种”,还说“弗理契是专门研究文艺科学的第一个人”“弗理契是唯物论的文艺科学的开创的人”,并且认为苏联公漠学院对于弗理契的研究,“一方面发现弗理契的观点之中的矛盾和错误,别方面也就是马列主义的文艺科学上的一个很大的进步”^{[3](P267-268)}。这一用法,已经和“革命文学”论争之初,为了避嫌,故意以科学的艺术论来代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用法有了很大的不同,它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科学主体观念的确立。

这些鲜明的“文艺科学”命名,说明了在当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以一个科学主体的身份被传播

②参见陈铨亚《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光明日报》1987年9月16日。关于最早“马克思”汉译及这段译文有很大争议,参见姜秀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翻译之梳》,《光明日报》2018年11月6日。

③关于这套丛书的出版过程、实际情况和学界有关的一些争论,可参见马鸣《译介“马克思主义的X光线”:冯雪峰与“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上海鲁迅研究》2020年第4期,第233页。

的。因此说,到了“革命文学”论争和“左联”时期,马克思主义不仅作为科学的代名词成为左翼文艺的指导思想,而且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科学和学科性质都得到了确立,其本身作为一个科学主体观念的认识也已经很成熟。

2.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根本性质的确立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论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即“现阶段上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4](P706)},基于这种性质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一种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毛泽东还认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4](P708-709)}。

在这个根本性质论述中,毛泽东继承了左翼文艺“艺术科学”的观念,提出了对艺术科学的新认识。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提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在这点上,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4](P707)}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出有“艺术科学的标准”,他说:“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也是完全必要的。”^{[5](P869)}这一系列论述,确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根本性质,也确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一个科学体系的性质和地位,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体系的建设

习近平指出:“学科体系同教材体系密不可分。”^[6]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引进、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同时,中国学者也开始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化的进程。1930年前后,中国学者撰述的体系性、原理性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述开始规模化出现,如钱谦吾编《怎样研究新兴文学》(南强书局1930年3月初版)、王森然著《文学新论》(光华书局1930年4月初版)、冯乃超等著《文艺讲座(第一册)》(神州国光社1930年4月初版)等。这些专著基本都是原理性的,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所开展的体系性学科建构。如顾凤城在《新兴文学概论》中所言:“我们这里所指的辩证法,即是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7](P93)},“上面我们不惮烦地说明辩证法的公律,我们要把握到唯物辩证法,我们才能懂得普罗列塔利亚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的问题”^{[7](P101)}。这些理论著述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体系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学科体系建设极大地促进了从思想到理论体系的转化。在《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后不到半年,在“孤岛”上海就出现了最早的新民主主义文艺理论专著——巴人的《文学读本》(半年后出了《文学读本续编》)。巴人在《文学读本》后记中写道:“最后,我有两点要特别声明,其一,对于中国文学的形式,我得到振铎兄的不少提示。我还应在此谢谢他借我许多参考书。其二,我在最后一篇里对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雪峰兄的《关于艺术大众化》引用得很多。”^{[8](P172)}这是最早依据《新民主主义论》而形成的“新民主主义现实文学理论划时期的杰作”^{[9](P48)}。

学科体系与理论体系当中各个研究方向的展开有紧密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除了文艺政策、文艺批评等少数二级学科之外,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体系并没有太多明确的分支学科,但在学术出版平台、教育研究机构、专业人才培养和队伍培养、学术批评等学科机制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经验,比如党领导下的“左联”以及后来的各种文艺界统一战线组织,左翼文艺运动时期的刊物和图书出版机制,从中央苏区的俱乐部到延安文艺运动时期设立鲁迅艺术学院及创立艺术教育制度和学科,建立各种奖励机制、设立“人民艺术家”等荣誉称号,在重庆、桂林、香港等地建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主要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宣传和批评的平台和机制,等等。这些广义的学科建设对后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体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许多做法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二、学术体系建设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发展最先走的是一条引进、传播、阐释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理论之路。1932年前后,通过瞿秋白《现实》等著作,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才与苏联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立起了直接联系,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理论开始马克思主义化。这个趋势到了延安文艺运动初期又形成了新的问题,因此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发动“民族形式”大讨论和文艺整风运动,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之路,在这个基础上,不仅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根本性质得以确立,其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也趋于成熟,基本完善。

“学术体系是对一个学科内部逻辑关系和原理性问题的探讨,从而构成学术体系。”^{[10](P5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虽然经历过多个阶段,但其学术体系的发展却是始终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辩证法唯物论——进行构建并展开的。总体来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术体系的核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理论知识体系,它们支撑起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术体系的主要框架。

1. 唯物史观基础上的文艺本质论及其学术体系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一种本质论文论体系。1919年5月,为纪念马克思101周年诞辰,《晨报》副刊连载渊泉(陈溥贤)翻译的河上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译文中的“意识形态”一词在汉语中是第一次出现。几乎同时,李大钊在《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5、第6号上连载《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中同样翻译了河上肇对“《经济学批判》的序文”的日译,汉译以“意识形态”对译今译“意识形式”、“观念上的形态”对译今译“意识形态的形式”。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术体系的建设是从对文艺本质或根本性质的追问开始的,它从唯物史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出发,创立之初就形成了文艺是社会意识形式之一的基本观念。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术体系开创之初,意识形态是一个中性概念,即一个科学性的形式所指概念。但随着20世纪20年代政治运动的发展,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发展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文艺根本属性的最基本的认识,意识形态概念在内涵上越来越具有政治规定性和革命性,阶级性逐渐成了意识形态的代名词。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中,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术话语主张阶级性、阶级斗争,自然就产生了文化领导权的问题,所以自20世纪20年代初期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开始,从大革命时期到延安文艺运动,从瞿秋白到毛泽东,都非常强调文艺的阶级性和文化领导权问题。文化领导权问题下包括了党性问题、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文艺政策等多个学术体系子项。文艺地位—功能论、文艺意义—价值论、文艺发展论等作为由文艺本质论而来的系列理论知识,与唯物史观的问题同样紧密联系在一起。

2. 唯物史观基础上的人民主体论及其学术体系

唯物史观强调人民大众是历史的主体,是革命的主体,也是革命的原动力。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从一开始就要求革命文艺为无产阶级服务,左翼文艺运动开创了文艺大众化讨论,到延安文艺时期确立了文艺为人民大众(主要是工农兵)服务的思想,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围绕“为什么人”问题所形成的学术体系。从“为什么人”这个问题出发,人民主体论、文艺大众化理论、作家立场和态度与思想情感、动机和效果、批评标准等问题就自然进入了这一学术体系序列。

因此说,唯物史观的文艺本质论、人民主体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术体系中的第一大理论脉络,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术体系建构的最底层逻辑。

3. 唯物辩证法基础上的文艺反映论认识论及其学术体系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一种客观主义文论体系。这种客观主义不是左翼文艺运动时期瞿秋白批评胡秋原时所说的那种无动于衷的看客似的客观主义,它指的是一种认识论上的客观主义,即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从五四时期瞿秋白、茅盾等主张反映论艺术观到左翼文艺运动时期对机械反映论(“镜子反映

论”)的批判,再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认识论,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术体系的第二大理论脉络。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他又说:‘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而为后来列宁所深刻地发挥了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的观点”^{[4](P663-664)}。毛泽东用“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概括了在“社会存在决定意识”和“说明世界改造世界”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实践论,所以“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这一表述既可以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实践论,也可以认为是实践论基础上的认识论。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5](P860)},就是根据这一认识论而形成的经典论述。“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也是过去为数不多“由中国提出而已为国际上通用的名词”^{[11](P2345)},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贡献之一。

在文艺反映论基础上形成的文艺与生活关系的讨论(文艺源流论、深入生活等)、改造主观主义等学术问题都属于文艺反映论序列。

20世纪40年代对胡风主观论的批判,虽然表象上是客观主义对主观主义(这里仅指主观论、主体性)的批判,但其本质是不同“政治力”背景下两种理论体系文论合理性的对立。因为生长于国统区环境下,胡风以延续五四文学精神、批判为主调的主观主义文论传统肯定不适合解放区和新中国文艺实践要求的,但其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包括以胡秋原为代表的“自由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术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丰富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术体系谱系。

4. 以现实主义为核心的艺术论及其学术体系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一种以现实主义为核心的文论体系。“现实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中始终处于中心的位置,与现实主义相关的诠释与争论,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主要历史脉络。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中有关真实性、典型、形象思维、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等问题的争论都是围绕着现实主义展开的。”^{[12](P70)}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现实主义艺术论体系是从五四时期的旧写实主义(也称为自然主义)发展而来。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中,现实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即作为“意识形态的现实主义”),或者说围绕着现实主义存在着一套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即“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这是现实主义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20世纪现实主义从主流到定为一尊的根本原因。现实主义意识形态性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后来现实主义一系列失误——比如20世纪50年代以后现实主义反而失去洞察生活能力——问题的根源。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艺术论体系是以现实主义为中心建立起来的。这里所说的“艺术论体系”是整个学术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相对于本质属性论、认识论、意义—价值论、地位—功能论、艺术生产论、发展论等范畴或论域,包括以美的规律、艺术思维、艺术特征(尤其是真实性和倾向性问题)、创作方法(也包括现实主义之外的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的创作方法问题)、作家作品、批评鉴赏、典型理论、悲剧理论、文学史论、理想艺术等话题为核心的学术体系子项,部分也涉及文艺政策、无产阶级文化理论等内容。

如果把审美理论体系也视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术体系一个子项的话,那么审美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和现实主义艺术论体系是基本吻合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现实主义体系基本建设完成,对以上所涉及的学术问题都曾进行了深入探讨。

5.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及民族形式问题等学术体系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一种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文论体系。1927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瞿秋白就提出了“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的所谓国情”的设想^{[13](P407)}。1930年5月,毛泽东为反对当时中国工农红军中的教条主义写了《反对本本主义》,这是毛泽东最早的一篇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张闻天、毛泽东等总结“左”的教条主义错误,认识到必须使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中国化”,才能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0月14日报《论新阶段》的第七节)报告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两大命题,提出了“国际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两结合的观点。1939年,张申府作《论中国化》也主张“许多外来的东西,我们以为,用在中国就应该中国化,而且如其发生效力,也必然地会中国化”^[14]。之后的民族形式大讨论和延安文艺整风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发展,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民族性、中国化学术体系的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1958年,毛泽东提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两结合”创作方法,周扬提出“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以及20世纪60年代的文科教材编写等,都是这一学术体系的发展。

6. 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载体的鲁迅研究及其学术体系

鲁迅研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术体系中是一种独特的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鲁迅之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意义就已经建立起来。鲁迅自身的思想、精神和文艺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术与话语体系建设的理论载体,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根本性质的人格化符号。如1933年瞿秋白撰写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既是鲁迅研究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术史上的名篇,它承载着大量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史论问题。

延安时期,毛泽东对鲁迅学术和话语体系的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4](P698)}鲁迅生前及逝世后,一直延续至今,鲁迅研究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术及话语体系建设的核心之一和重要理论载体。

对照习近平对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的要求^[6],鲁迅研究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术体系中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领域之一。顺便提及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红楼梦研究也具有这种意义和价值。

学术体系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三大体系”建设的核心,也是成就最为突出的部分。学术体系的发展反过来也促进了学科体系、话语的发展。比如,1930年前后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原理性著作还处于方法论体系阶段(即强调作为论理学方法论的唯物辩证法),前述顾凤城观点就是例证。到了1940年以后,以蔡仪《新艺术论》为代表的反映论艺术论确立后,教材原理的编写进入认识论体系阶段(即强调作为认识论的唯物辩证法)。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三大体系”发展的共生现象。

三、话语体系建设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15](P525)}不同理论体系主要体现为不同的话语体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话语体系主要可以概括为“革命话语”“民族国家话语”“人民话语”“辩证话语”四大类型。但四大话语体系不是一步成形的,而是存在

着发展性、过渡性,体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特点。比如革命话语就经历过旧民主主义革命话语、无政府主义革命话语到无产阶级革命话语的转变,最终包含了很多政党政治话语在里面,因为20世纪的革命形式主要是政党革命;而民族国家话语也经历过国际主义话语和对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话语批判的阶段;人民话语则是从阶级话语转换而来的(但始终保有阶级话语这个内核);辩证话语也是从克服各种机械论、庸俗论和教条主义而来的。前三个话语对应的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民族的”“大众的”两种根本性质(根据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解释,二者也具有革命性和民主性的内涵),而体现“科学的”根本性质的话语体系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辩证话语体系,没有这个具体话语体系,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是不完整、不科学的,也不成其为一个文艺理论体系。

1. 革命话语体系

20世纪是世界范围的革命的世纪。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题就是革命。革命话语是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内许多理论体系的第一话语。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整个革命话语形成的过程相一致,从外延角度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革命话语同样经历过从旧民主主义改良和革命话语、无政府主义革命话语到无产阶级革命话语的转变;从内涵的角度看,革命话语则经历了从文学改良、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从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转换和发展,才最终形成的。这种无产阶级革命话语贯穿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全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被建设话语、改革话语等话语类型所延续、补充和丰富。

晚近的20世纪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研究也有意突破既往围绕着革命话语与其他话语体系的各种二元论建构模式,比如革命与改良、救亡(革命)与启蒙等的二元对立关系,体现了革命话语与其他话语体系的对话关系,但这并没有解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早期革命话语体系存在的事实。

2. 民族国家话语体系

20世纪也是世界范围内民族国家独立解放的世纪。马克思主义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左翼文艺运动是国际性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早期是一种国际主义话语(它和五四时期的世界主义话语不是一回事)、无产阶级话语。这种国际主义话语性质,在1932年以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中体现得特别明显,也是造成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早期关门主义和机械阶级论的根本原因。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情绪高涨,联合抗日的呼声很高,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早期阶级话语遂逐渐向民族国家话语过渡,随着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而发展,至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民族国家话语”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主要话语体系之一。左翼文艺运动后期发生的“两个口号”之争,其核心都在于民族国家话语问题。当然,这里的“民族国家话语”和当时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话语是两回事,“民族国家话语”偏民族叙事,对当时为资产阶级右派所利用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进行了批判。完整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话语”基本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出现的。

3. 人民话语体系

20世纪还是世界范围内人民的世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历过从阶级话语到人民话语的转变。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早期革命文学运动、左翼文艺运动和苏区文艺运动时的话语体系主要是阶级话语体系^④。但左翼文艺运动后期以及中央红军长征结束之后,因为民族解放的形势和要求,民族话语和人民话语开始成为主体话语。在文本上,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瓦窑堡会议)》和会议结束两天之后毛泽东所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

^④1927年国共合作失败之前,中共话语体系中也频繁使用“国民”意义上的“人民”概念,但1927年以后使用“人民”一词的频率大为降低,“阶级”一词使用频率突起,1935年以后“人民”话语再度兴起。

策略》报告,标志着政治意义上人民概念的形成,文章提出了建立人民共和国的设想,确立了阶级话语向民族话语、人民话语转换的趋势。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关于“人民”概念的经典论述:“那末,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5](P855-856)}此后,由于“人民性”概念的输入,郭沫若等提出“人民文艺”等概念,伴随着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传播,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人民话语体系开始蓬勃发展。

到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周扬总结解放区文艺运动,作了题为《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报告中周扬认为:第一,真正的新的人民的文艺是从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就开始了;第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规定的文艺方向也就是新中国文艺的方向。周扬报告依据大量艺术事实,得出“解放区的文艺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这一结论,并且确认:“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16](P371)}从而以一种政治权威的方式,宣告了人民话语体系的最终确立。

4. 辩证话语体系

建立在唯物辩证法基础上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一个艺术辩证法体系,辩证话语是其话语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辩证话语也可以称为“艺术辩证法话语”,它概括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对艺术本体、自主性和规律性各种辩证关系问题的论辩方式,尤其是“历史/生活—艺术”之类范畴,比如本质论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问题,还概括了主体论中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问题、立场与态度问题、普及与提高问题、歌颂与暴露问题、作品论中的内容与形式问题、反映论认识论中的自然形态与观念形态问题,以及创作论中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两结合创作方法问题,真实论中的真实性与倾向性问题,典型论中的个性与共性问题、阶级性与人情人性问题,批评论中的政治标准、艺术标准和社会效果论(包括动机和效果)问题,发展论中的批判继承问题、发展不平衡问题,文艺统一战线上的同路人与革命人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问题的讨论都是以艺术辩证法的形式展开的。因此说,辩证话语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也体现了其话语体系的主要特征。

当然,除了以上四种话语体系之外,还存在其他大量的话语体系分型,比如现代性话语、启蒙话语、社会主义话语等。但这些话语体系在概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合理性方面各有其不足。以社会主义话语为例,虽然早在1926年,郭沫若最早提出“社会主义文学”的口号,他在《文艺家的觉悟》(1926)中提出:“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文艺是站在第四阶级说话的文艺,这种文艺在形式上是写实主义的,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17](P111)}并在《革命与文学》(1926)中提出“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的口号^{[17](P119)},但作为一种文论的社会主义话语还是要到20世纪30年代才真正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才真正流行起来而成为一个主要话语类型。“国家话语”也是大致类似情况。因此,我们这里并没有把社会主义话语概括进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早期具体话语体系。

四、余 论

“三大体系”建构是国家领导人对我 国社会科学未来发展提出的一种目标和要求。对比这一目标和要求,我们应该看到,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三大体系”建设“前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大体系”建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有其时代的烙印和局限性,对其理论不足和带来的教训,我

们同样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首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仍处于“三大体系”草创阶段,整体上受外来影响较多。这个特征在前期更为明显,这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三大体系”早期建设带来了很大影响,如俄苏、日本马克思主义中的“极左”思潮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就产生过消极影响,其错误影响经过批判后才得以消除。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大体系”建设长期处于民族化、本土化过程中,其真正民族性乃至世界性特征的形成及成就的取得,则是在毛泽东文艺思想诞生之后。因此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三大体系”建设既有经验和成就,也有失误与教训。

其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们的学科概念、学科自觉与今时不能相比,当时的学科体系建设对于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指导、规范和推动作用不太明显,三者发展并不平衡。而相比学科体系建设的不足,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却具有开创性和范式性,反过来推动了学科体系的发展,对后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1958年毛泽东提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周扬提出的“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以及20世纪60年代的文科教材编写等,都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在新阶段延续和发展的典型例子。

总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三大体系”建设的成就、经验乃至教训,可以为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借鉴。因此,我们有必要重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三大体系”建设情况。

[参考文献]

- [1]李大钊.李大钊全集(3)[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2]施蛰存.沙上的足迹[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 [3]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2)[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6]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02).
- [7]顾凤城.新兴文学概论[M].上海:光华书局,1930.
- [8]王克平,钱英才.巴人文艺短论选[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8.
- [9]王克平.《文学论稿》的版本介绍[J].上海鲁迅研究,2011(4).
- [10]李心峰,李若飞.构建中国艺术学的“三大体系”:李心峰教授访谈[J].艺术学研究,2020(1).
- [11]冯契.哲学大辞典(修订本)[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
- [12]旷新年.从写实主义到现实主义:中国新文学对现实主义的理解、接受与阐释[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4).
- [13]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4)[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14]张申府.论中国化[J].战时文化,1939(2).
- [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 [16]周扬.周扬文论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 [16]饶鸿兢,等.创造社资料(上)[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王 健)